

医疗与布道：



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 医疗服务研究

邓杰 著

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是整个边疆服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事这一问题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中华基督教会在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透视，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基督教在华传教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变化，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开发是如何起步的，

弥补过去历史研究仅仅关注中国沿海及内地，却严重忽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形成的认识偏差，

从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认知角度，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重建提供完整的重要的补充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医疗与布道：

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
医疗服务研究

邓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邓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161-0064-6

I. ①医… II. ①邓… III. ①中华基督教会—卫生服务—
研究—四川省—1939~1955 IV. ①B977.2②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7763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402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杨天宏

边疆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季曾经处于“显学”的重要地位。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治学的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研究领域看，清季的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的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包括医学史在内的自然科学史或身体史，则更是鲜有问津者。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致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边疆地区所作考察，其中法国天主教徒及英国基督徒投入的精力最多。^①

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则开始起步。边疆研究此时受到重视，一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学”之“东渐”，导致学者在研究手段上的突破有关；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也刺激并促成了此项研究的发展。^②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西移。一时间，大量学人荟萃西南一隅。以

① 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徐益棠对此作了如下记述：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收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我中华者，年有增加，归则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已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1906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第51页。

②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蒙藏委员会编印：《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第1页。

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边疆研究亦因民族危机的刺激，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①

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再度受到学者关注，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关研究蔚为大观。但无论近人还是今天的学者，对于基督教所作医疗布道工作均缺乏研究，对于基督教在四川西部羌藏及西康彝族地区活动的研究更是远远谈不上具体深入。20世纪40年代，李万方对既有边疆研究脱离边地实际的状况曾表示不满，称研究者仅仅是“坐在建昌研究”，或“站在大渡河那边大写其文章”，认为这种有类雾里看花的研究状况不改变，国人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边疆。^②

就基督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医疗布道活动的研究而言，状况也不容乐观，很多重要的领域长期无人涉足，相关成果几近空白。而教会在华医疗布道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至少从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立场上观察是如此。传教士贺夫曼（Dr. Hoffman）说过：“医药布道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看到医治疾病，有比较他们古老而迷信的办法更好的方法，使他们改正对于疾病与生活的错误观念与态度。”^③ 1838年，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在广州成立。这是新教传教士和外籍医生提倡的将医学与传教事业明确结合为一体的第一个全国性西医学机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医务传道会。一百年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继承教会先驱的遗愿，深入川、康民族地区，开展服务边民的“社会福音”工作，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将西医、西药带到川、康边地，使当地200万民众受益，而医疗布道则是这场教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杰博士此项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完整重建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

① 张伯怀：《服务运动之重要》，《边疆服务》第2期，1943年6月，第1—2页。

② 李万方：《谈本部为宁属边民服务》，《边疆服务》第4期，1943年11月，第11页。

③ Dr. R. E. Hoffman, *Journal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Assoc. of India, Burma and Ceylon, Efficiency in the Task of Medical Missions*, Jan. 1940. 转引自海珥玛著《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何慈洪译，广学会出版，1939年5月初版，第4页。

务部在川、康边地医疗布道的历史，从教会医学史及宗教史研究的角度，丰富了既有的边疆研究。与涉及边疆民族及宗教的既有著作相比较，邓杰所做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在西方教会医疗布道的宏观背景下观照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所作医疗布道工作。从历史研究的立场上看，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场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众多事件及人物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深入川、康民族地区开始医疗布道工作，与教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有关，又是基督教在中国寻求“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具体体现。如果不注意观照其联系，孤立地分析与叙事，会让人不得要领。反之，一旦把握住了“边服部”活动在当时特定语境下的位置，不仅历史事件及人物本身能够活现在作者书写的文本之中，其内涵及意义也能够充分凸显。二是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既有学术研究状况。在这方面，邓杰博士所下工夫可谓不小，其著作不仅详尽评述了事件发生当时相关的历史记述，对于后人的研究也能全方位调查分析，明其得失利弊，实事求是地交代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相关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节点。

粗略统计，该书搜集利用的各类文献逾 300 种，其中档案资料的搜集工夫尤其到位，全书利用了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阿坝州档案馆、汶川县档案馆、甘孜州档案馆、理县档案馆、西昌市档案馆所藏主要“边服部”档案，可以说，但凡藏有边疆服务历史档案的档案机构，作者都已走遍。其他文献的利用也很到位。有些当时当事人留下的资料，如边疆服务部办的期刊《边疆服务》、《边疆服务研究》，以及教会在全国范围发行的《公报》、《协进》、《田家半月报》、《真光杂志》、《基督教丛刊》、《天风》、《真理与生命》及大量教外人士创办的报刊杂志，在邓博士的书中都得到充分的利用。这种史料搜集上近乎竭泽而渔的工夫，使分析论述立于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避免了时下普遍存在的貌似高深学术探讨实际上严重缺乏事实支撑的玄学似的无根之谈。

就形上层面的问题探讨而言，因为有翔实的事实材料支撑，两者呈现出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局面。书中纯主观性的分析虽然不多，但却得其要领。在其著作中，作者着力讨论了西方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在川、康民族地

区的初期传播与基督教福音传播的关系问题。作者发现，教会同时做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使自己处于吴义雄教授研究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早期活动时指陈的介于“宗教与世俗之间”^①的尴尬位置。教会内主张社会福音的“自由派”认为处于现代环境之中，以提供实际的利益来体现基督教福音乃教会的必由之路，而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则认为其取径离经叛道，希望回到传统的布道立场，反对教会去做在本质上与宗教不相干的事情。然而何为相干何为不相干本无定论，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地区的“医疗布道”活动于是处于在两条路线之间游移不定的状态。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混乱与中华基督教会是一个标榜超越教派的诸派合一的教会组织有关，不同宗派的人因宗教上“本色化”的需求走到了一块，但思想主张的分歧终究是难以弥合的。

然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宗教界，自由派的思想路径毕竟相对主流，受其影响，边疆服务部尽管强调兼顾两者，却将主要精力用到近乎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业上。这给当地民众带来了诸多实惠。差不多与世隔绝的边民接触属于外来宗教的基督新教，经由的大多是这样的管道。这种看似缘木求鱼的布道手段，产生了教会人士未曾想到的布道效果，相对内地汉民族地区，至少在羌族、彝族地区，教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拾回了此前因民族主义浪潮波及以及地震灾害而失去的在当地布道的“领地”。这种伴随着纯粹福音主义丧失而获得的实惠，对于教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邓博士的研究虽未得出结论，却无疑给出了可供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事实材料。

从纯粹医学史的角度观察，邓博士的研究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近年来，人类“身体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为历史学开拓了一个具有广阔探索空间和研究前景的领域。虽然疾病医疗史不等于身体史，就是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研究与身体史也有明显差异，但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存在的亲和力则是无法否认的。就学术现状而言，至少在国际中国史学界，目前仅见的中国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

^①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1、318 页。

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关注身体的。^①但迄今几乎所有中国近代疾病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和汉人身上，涉及川、康地区羌、彝、嘉戎等少数民族疾病身体史的系统研究，至少我本人尚未读到。邓杰博士的研究，对于亟亟探究身体史研究的趋新学者，提供了为其忽略的边疆民族区域史研究的事实参照，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就研究取径观察，现在标榜做“身体史”研究的国内学者偏重于揭示其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含义，很少进入纯粹医学史领域。边疆服务部曾对川、康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调查资料，为该地区少数民族身体史的重建提供了研究素材。像黑热病、回归热等传染病在该地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医学史的一项空白，对于该数种疾病在高山地区的防治，提供了病理学及药理学的依据。另外，“边服部”医院诊所在将近16年的时间里诊治边民各种疾病留下的病情数据及治疗手段记录，亦可视为今日该地区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边服部”所创建的从地区中心医院到星罗棋布于各主要村镇、学校的诊所，再到以定期巡诊方式派出的医疗队这一整套医疗体系及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为居住范围甚广且极为分散的边民提供了现代医学的制度性保障，对于国家在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邓杰博士以其学术慧眼，关注到了这一切，并通过长达数年的开创性工作，将许多对于身体史研究具有非同寻常价值的医学史素材，梳理出事实逻辑，展现在读者面前。

邓杰博士能够完成这一学术工程是很不容易的。我与邓杰是在我最初任职的四川师范大学认识的，算起来我们结下师生之谊已经10年了。她先是跟我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硕士，又随我到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作为已有家小且对家庭富有责任心的女博士，她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但她的长处在于能够吃苦，有一股从大巴山里走出来的女性特有的韧性。看到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奔波于成都与达州两地，我曾经怀疑她能否顺利完成学

^① 比如目前这一领域少数最有成就者之一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较早曾从事18世纪中国的分娩这一与医疗紧密相关问题的研究，当时，她完全是以社会史的主题与取向来形塑的，而后，她逐渐以月经和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身体本身的历史。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蒋竹山译，《新史学》1999年第4期，第130页。

业。在我不完全知道她的困难的情况下，我有时会很严厉地批评她，以至于其他同学告诉我她曾为我的不宽容多次落泪。但用她后来告诉我的话来说，她终于咬着牙硬挺过来了。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我想支撑她一路走过来的就是这种追求自我完善、追求个人价值升华的精神。邓杰的博士论文，尽管高标准要求，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其主要缺点是客观材料多而主观认知少，形下叙事多而形上分析少，但以今日多数国产博士论文的标准衡量，已经可以算是上乘之作了。拿到博士学位之后，邓杰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2008年，她以这一课题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利用这笔基金资助，充实完善了既有研究。现在她奉献给学术界的就是她的博士论文的补充修订本。作为她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我见证了她在学术上每一步的成长并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邓杰博士能够志存高远，继续努力，不断探索，在学术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2011年9月9日于成都川大江安花园寒舍

目 录

序.....	杨天宏(1)
绪论.....	(1)
一 课题缘起.....	(1)
二 学术史的回顾.....	(4)
三 相关文献资料概述	(13)
四 研究方法与伦域界定	(25)
第一章 边疆服务运动兴起的背景	(28)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28)
第二节 政府的边疆政策与总会立案	(36)
第三节 教会的“本色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	(45)
第二章 边疆服务部筹建及“边运”的开始	(53)
第一节 《宣教事工办法大纲》的制订及四川大会的态度	(53)
第二节 诚静怡去世及未竟事业的继续	(65)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支持与边疆服务部的成立	(73)
第四节 服务区的开辟及其分支机构的建立	(87)
第三章 边疆服务中的医疗卫生事业	(95)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医院”制度及医疗卫生状况	(96)

第二节	边疆服务部医疗卫生机构概况·····	(100)
第三节	川西服务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104)
第四节	西康服务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143)
第五节	“边服部”医疗事业与边区公共卫生的改善·····	(159)
第四章	“边疆研究”中的医学研究·····	(169)
第一节	近代以来的边疆研究及其缺陷·····	(170)
第二节	“边服部”对边疆研究重要性的认知·····	(175)
第三节	对川西区地方疾病的调查研究·····	(178)
第四节	对西康区地方疾病的调查研究·····	(187)
第五章	学生暑期服务团的医疗服务·····	(191)
第一节	学生暑期服务团的筹设与组织概况·····	(191)
第二节	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内涵与特点·····	(197)
第三节	学生暑期服务活动中的医疗活动·····	(200)
第四节	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社会影响·····	(203)
第六章	医疗卫生服务与基督教福音事业·····	(206)
第一节	医疗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初期发展·····	(207)
第二节	“边服部”对医疗布道工作的认识·····	(211)
第三节	布道工作的开展及医疗布道的方式·····	(218)
第四节	医疗布道与边民吸毒恶习的改变·····	(226)
第五节	“边服部”医疗布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31)
第七章	“边服部”向政府移交卫生工作及“边运”的终结·····	(237)
第一节	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及教会的反应·····	(237)
第二节	“边服部”同工的思想改造及控诉运动·····	(243)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服部”的卫生服务工作·····	(258)
第四节	“边服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活动·····	(268)
第五节	政府接管与“边服部”卫生事业的终结·····	(273)

第八章 余论·····	(281)
第一节 “边服部”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	(281)
第二节 “边服部”医疗事业的成就和社会影响·····	(288)
第三节 “边服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局限·····	(298)
 附录 重要文献及图表·····	 (307)
 参考文献·····	 (350)
 后记·····	 (383)

绪论

一 课题缘起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1927年^①在上海成立，1937年完成在国民政府的立案手续，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在中央取得法人资格之基督教会”。^②

1939年，随着国民政府抗战中心转移到西南后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遂随之将工作中心转移至文化意义上的“边疆”——川滇黔三省份。^③此前，“总会”总干事诚静怡特“西行入川，道经滇、桂、黔、川

①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向四川省社会处“呈请签核备案”，缕述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时，称总会于民国15年，即1926年在上海成立。见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成立经过情形》，全宗号38，目录号2，案卷号2448。该馆另一卷宗也有有关论述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情形的记载。参阅该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函：为缕述本会成立经过情形》，全宗号93，目录号2，案卷号1532。而其他诸如秦和平在《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中称其成立时间为1927年；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也说总会成立时间为1927年（该文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1939年12月10日，在成都各界为诚静怡举行的追悼会上，张伯怀也称总会成立的时间是民国16年，即1927年。故此处采用1927年说。

②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四川省社会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前后经过情形、公报》，全宗号：民186，目录号2，案卷号1835。

③ 关于“边疆”一词的含义，著名藏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曾谈到：“所谓边疆乃对内地而言。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其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参见李安宅《边疆与社会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编：《边疆服务》第8期，1945年7月第6页（以下《边疆服务》不再注明编印者）。

等省,目睹西南各地苗彝羌番等少数弟兄民族文化落后,生活贫苦”,^①认为这些民众“内心都有宗教需求”,感到“布道机会之广大”。同时,“各地流离到此的信徒,遭受身心的痛苦,宗教对他们内心的慰藉,委实是他们生活的基本要素”。“一般的民众在热烈的追求一种培养心灵的宗教,尤其一般的青年,都在渴求着真理。从这种情形看来,宣教事工的发展,实有未可限量的前途。”^②于是,“为唤起全国各地会友的同情心,俾能集中力量,参加宣教事工大运动,首先迎合西南传道大开之门户,满目庄稼发白的良机起见”,^③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西南宣教区”(简称“西南宣教区”)。西南宣教区包括贵州宣教区、云南宣教区及边疆服务部。^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创办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以下简称“边服部”)是由诚静怡发起,总会边民事工委员会开办的“向边民宣教事工”的团体。^⑤其实地工作区域有三个:一是川西服务区,于1939年底正式开办,以川西茂县专区之理县为中心,主要以羌、戎等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二是西康服务区,以西昌为中心,于1940年开办,主要以彝胞为服务对象;三是云南服务区,以寻甸为中心,1943年开办,主要以苗胞为服务对象。其活动主要是在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从事服务工作。“边服部”主要本着以下活动信条为边民服务:“一、三民主义为立国行政之根本大道;二、四海兄弟为民族团结之理想目标;三、边疆服务为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四、立己立人为服务运动之哲学基础;五、吃苦耐劳为

①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宗教事务处:《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表》,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5。

② 胡翼云:《大时代的新事业》,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1940年复月,编号U102-0-27,第16页。

③ 《全国各地教会的响应》,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1940年复月,编号U102-0-27,第27页。

④ “为要传达(西南)宣教事工的消息,为要发动信徒群众的力量,除在总会公报上发表宣教方面的消息外”,总会特于1950年12月开办《西南宣教通讯》,“藉收声应气求,精诚团结之效”,“鼎立匡扶”西南宣教运动。但此期刊似只开办这一期。

⑤ 《边民宣教近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总会宣教事工同年工会时刊》1940年复月,编号U102-0-27,第7页。

服务精神之自然表现；六、实事求是为服务人员之正常作风。”其服务“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化导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胞知识，救济边胞疾苦，改善边胞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充实国家力量”为原则，^①活动内容主要包括：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传播；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希望能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

边疆服务活动曾在教会内部产生过较大影响。余牧人在《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一文中指出，“边服部”的这一活动是“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种新工作，对教会，对国家，都有莫大的贡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②沈亚伦认为，基督教在1911年至1950年的历史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而1937—1949年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坚忍”时期；文章认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这一时期救护难民、服务伤兵的活动及“边服部”对少数民族的服务工作是基督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值得纪念”，是一种在“艰难中产生的事工，实在是可宝贵的”。^③《中华年鉴》甚而将它纳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的范畴，加以肯定。^④

“边服部”活动不仅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且在服务区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担任“边服部”“名誉主任委员”的孔祥熙曾说：“他们（按：指“边服部”同工）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已博得了边胞的信仰和爱戴，取得了地方同胞的赞助，引起了当地官绅的同情；中央各方面凡去参观过他们的工作的，也都一致地称道。”黄炎培更是亲自到“边服部”的工作区视察，对“边服部”服务边区的成效表示赞扬。^⑤川西地方的头人及各寺院的喇嘛，把曾给他们看病的“边服部”人员当作大恩人看待。^⑥1947

① 以上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服务信条》及《服务原则》，《边疆服务》第23期，1948年3、4月，第26页。

② 余牧人：《抗战八年来的中国教会》，《基督教丛刊》第9期，1945年2月，第9—11页。

③ 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46页。

④ Chi-hsien Chang (张启贤), *Religion,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0—1941)*,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a. p. 89.

⑤ 以上参阅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全宗号51，目录号4，案卷号251。

⑥ 《本部消息：四土行功果圆满》，《边疆服务》第17期，1947年5月，第24页。

年5月，威州各界人士曾写上《威州各界人士为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列台先生服务勤劳志颂》，赞扬“边服部”人员的服务精神。^①

“边服部”服务工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美教会团体不但派人参与“边服部”工作，还时时表示对“边服部”工作的关心。^② 据曾任“边服部”秘书的柯乐智1946年介绍：“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报告各地教会事工，计十五章，其中有一章是专门叙述边疆服务部的历史与概况的。还有其他的教育刊物也常刊载本部的各种实地工作。我正在计划编一本专刊，报告我们实地工作的真相，一面为照片，一面为英文说明（中文本也同时在编写中），俾国外的同道们都能明了我们的工作。”^③

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是整个边疆服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这一问题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透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基督教在华传教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变化，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开发是如何起步的，弥补过去历史研究仅仅关注中国沿海及内地，却严重忽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形成的认识偏差，从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认知角度，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重建提供完整的重要的补充资料。

二 学术史的回顾

然而，对于这一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现有学术研究状况实在难饜人望。

刘吉西等编写的《四川基督教》是目前笔者所发现的对“边服部”活

① 《本部消息：威州各界人士为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列台先生服务勤劳志颂》，《边疆服务》第18期，1947年6月，第19页。

② 如1946年圣诞节将到的时候，曾参与“边服部”工作的美国人柯乐智寄来国币二十万元，在上海的高瑞士牧师寄来国币十万元，作为“边服部”同工子女的圣诞礼物。参见《本部消息：圣诞礼物海外来》，《边疆服务》第13期，1947年1月，第20页。

③ 《川西新闻：威州欢迎柯秘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编：《边疆服务通讯》第6期，1946年4月，第7页（以下《边疆服务通讯》不再注明编印者）。

动叙述最为详尽的著作。该书第七章“社会服务机构和慈善事业”中叙述了“边服部”创建的过程、“边服部”的经费来源、“边服部”办事处即负责人的变迁、“边服部”建立的三个服务区及各项服务事工、“边服部”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发动的大学生暑期服务,以及“边服部”的结束等。还附录有川西、西康区各类服务点一览表、分布图和“边服部”工作人员名单。^①另外,此书第五章对“边服部”开办的“佳山寨小学”的成立经过、学校办学状况都有所涉及,还开列了曾在该校工作的人员名单,为以后对“边服部”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第六章还就“边服部”所创办的威州医院的创办经过、医院地址的变迁、医院负责人及其他一些相关情况作了简要叙述。

但此书仍有缺漏,主要在于:第一,该书在叙述“边服部”各服务点时,所涉内容太粗疏,有的甚至是静止地叙述事件;^②第二,在其所列各服务区实地服务点的表格中,一方面没反映出各服务点开办及结束时间,另一方面也没说明各点的开办形式(如自办、与县府合办等),有些服务点的相互并转等情况,也不能从该表中找到线索;第三,该书第466—473页较为详尽地列出了“边服部”工作人员名单,在文末作者虽说明了此名单来自于“边服部”自办刊物《边疆服务》杂志及通过总部负责人崔德润、刘龄九的补充更正,但据笔者所拥有的资料查证,曾在“边服部”工作过而没在此名单中的人员仍有不少;第四,该书虽引用了一定的原始资料,但是对档案资料等方面利用不够。因此,该书的研究成果远不能让人满意,仍有可再作研究的较大空间。

秦和平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是对“边服部”活动进行较为详细阐述的另一要著。该书在第三章“基督教在四川民族地区的传播”中将“边服部”活动列了专节加以讨论。在第三章第三节中,秦著首先简要叙述了“边服部”的由来,其次分别叙述了川西服务区、西康服务区的服务内容,特别是对川西区的服务内容介绍较为详细,不但叙述了

① 参见刘吉西等编写《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54—474页及该书的其他相关章节。

② 例如该书第459页,在叙述西康服务区的小黑箐小学时,说“全校32人,二年级4人,二年级9人,一年级14人,幼稚班5人。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4岁”。实际上,在不发达的边区开办教育,前来就学的学生人数时刻都处于动态变化中。